

以文学“修通”历史创伤？

——兼论多米尼克·拉卡普拉的跨学科之思

但汉松

[摘要] 作为当代创伤研究的重要批评者,美国学者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提出了一种基于“修通”的替代性理论。他认为以卡西·卡鲁斯等人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创伤理论,过于关注历史创伤带来的强迫性重复和解离效应,无益于真正的批判性反思和面向未来的现实政治。通过厘清拉卡普拉如何审视“9·11”前后西方文学批评中“趋创伤性”的流弊,可以揭橥这位思想史学者关注的一个更大问题,即文学与历史如何在学科性的自反层面相互商榷、相互审问,从而实现真正的跨学科之思。

[关键词] 拉卡普拉; 创伤; 修通; 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23]02-0059-10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23.02.023

2014年,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重版了《书写历史,书写创伤》(*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2001)一书。在新版序言中,他强调了后“9·11”语境对该书修订的重要性:“‘9·11’针对双子塔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很快就被当作一种新的起源创伤,然而它不过是另一个源头可疑的神话……要想当一个好美国人,甚至要想当一个好人,你在某种意义上就必须因‘9·11’而受到创伤,并且携带着后创伤的影响印记,包括支持反恐战争。”^①拉卡普拉对美国当代起源创伤的忧虑,体现了这位思想史学者一直以来对“创伤研究热”的批判性介入。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大屠杀记忆从历史的阴暗地带走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前台,“奥斯维辛”成为电视和报纸上炙手可热的流行词。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甚至担心“大屠杀产业”的兴起会带来“过度的社会宣传和一种试图去除所有表达限制的倾向”^②,创伤研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的。以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等人为代表的创伤学者,试图与弗洛伊德基于性别的创伤心理阐释分庭抗礼,不再以菲勒斯中心主义来看待创伤患者的心理压抑,而是寻求一种更为普适的、更具社会人文关怀的创伤修复技术。以卡西·卡鲁斯(Cathy Caruth)等人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创伤理论,则将创伤作为一种“历史意义必将付之阙如”的隐喻。如果说赫尔曼更多关注的是个人历史,其学说主要适用于心理咨询和临床的创伤治疗,那么卡鲁斯则是对“后大屠杀”时代的文化状况进行一种症候式解读。本文无意重述当代主流创伤理论的各种观点,而是希望揭示创伤研究内部的关键争鸣与歧见,在此基础上引出拉卡普拉对经典创伤模型的批判与修正,并由此推敲一个更具思辨性和当下性的议题:重审创伤政治的核心,在于激活文学与史学的跨学科性。

作者简介:但汉松,男,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Revised Edi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viii.这里,拉卡普拉所说的“起源创伤”(founding trauma)明显是在戏仿文化研究中的所谓“起源神话”(founding myth),二者指的都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断裂-创生性事件。就美国而言,最典型的起源神话无疑是“五月花”号和独立战争,而最早的起源创伤则是南方奴隶制和美国内战。

^②Geoffrey Hartman, “History Writing and the Role of Fiction,” in R. Clifton Spargo and Robert M. Ehrenreich (eds.), *After Representation: The Holocaust, Literature and Culture*, Rutgers UP, 2010, p.31.

一、创伤研究及其不满

拉卡普拉与卡鲁斯在创伤研究上到底有何抵牾之处呢?首先,作为保罗·德曼(Paul de Man)的弟子,卡鲁斯认为创伤不只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更是语言、历史和记忆相互纠缠的症候。或者更具体地说,个体对于创伤经验的探寻和把握,很像是解构主义者眼中认识历史真相的过程,即历史总是以后见之明的方式来言说的。尽管人们总希望去把握历史的本质,但历史的真相本质上又是无法被我们把握的。基于这种相似性,卡鲁斯试图用解构主义的方法来分析文学和历史中的创伤叙事。她的这个立场深刻影响了近20年来人文学领域的创伤理论研究。

对卡鲁斯来说,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描述了受创伤主体的强迫性重复。这种重复并非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发生,但亦不属于神经官能症。^①如卡鲁斯所言,它常体现为强迫性记忆:“在时间、自我和世界的经验中受到的破坏,不像身体伤害那样简单并且可治愈,它其实是一次事件……它被体验得过于迅速,也完全出乎意料,以至于它无法被完整地认识,所以它未被意识获取,除非它能在重复的梦魇或幸存者的重复行为中不断出现。”^②这种特殊的记忆机制对理解创伤体验所特有的时间结构非常重要,它甚至可以从个体病症扩展到整个文化史的范畴。卡鲁斯更进一步,将这种强迫性重复视为主体和他者的对话。她强调,这种对话并不一定发生在创伤主体的内部,它更多地体现为我们的社会成员对于受创伤主体的倾听,因为这些人类声音代表了“从伤口发出的他者谜团”^③。不难想象,文学批评家之所以关注创伤叙事,与其说是寄希望于创伤患者的康复(这更多是专业的心理治疗师的工作),毋宁说是人文学者在寻求一条认识历史的道路,他们希望在看似病态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找寻被遮蔽的历史真相,并以符合伦理的方式去理解那些历史创伤的受害者(即他者)。

正是从创伤叙事的角度出发,卡鲁斯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即“双重讲述”(double telling)。它对应着创伤叙事的两个层面——一个是与死亡遭遇的故事,另一个则是作为幸存者的故事。^④因此,双重讲述既涉及生命个体在历史暴力中如何湮灭,也关乎亲历创伤事件的幸存者对于生存的复杂体验。卡鲁斯的这个概念是对大屠杀叙事中“不可能的见证”这一说法的补充。幸存者不只是帮助死去的人做出不可能的见证,同时他们的证词也关乎自身作为幸存者的经验。这种经验既饱含着对生命的珍视,也有苟活的耻感。它的矛盾性不断折磨着当事人,并以创伤的强迫式重复威胁着将生命主体拖入深渊。所以,“双重讲述”实质上面对着两种危机:死亡的危机和生命的危机。

表面上看,卡鲁斯似乎非常强调这种“双重讲述”及对其倾听的必要性,但她的解构主义立场(部分也来自拉康发展的弗洛伊德主义)使她得出一个悲观结论:无论在伦理上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这种讲述和倾听在本质上仍是无效的交流。受害者必定无法真正说出自己关于死亡和生命的双重危机,倾听者也注定无法真正有效地理解这种讲述。卡鲁斯对于创伤的不可言说性和不可再现性的论证,深受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广岛之恋》的启发。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无法真正理解对方的故事——哪怕在历史上,他们的经历通常被归于同一场战争灾难。日本男人告诉法国女人:“你在广岛什么也不曾看见。一无所见。”她回答:“我都看见了。毫无遗漏。”她还说,“和你一样,我知道要忘记的是什么。和你一样,我有记忆。我知道要忘记的是什么。”然而他却否认说:“不,你不知道要忘记的是什么。你没有记忆。”^⑤和卡鲁斯一样,杜拉斯当然不是说创伤者没有任何记忆,问题在于他们只有碎片化、幻觉化的强迫性重复记忆,其内容和再现方式亦真亦假,并不能真正呈现历史。因此,在创伤记忆和真相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断裂。创伤不断让主体意识陷入过去的暴力记忆,同时也切断了语言和意识的通道,使得这

① See Gregory Zilboorg, “Introduction,” in Sigmund Freu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W. W. Norton & Company, 1975, p. xiv.

②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

③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p. 3.

④ See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p. 7.

⑤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广岛之恋》,谭立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1页。

种经验无法被语言完整地表达,也无法被意识真正地认识。因此,卡鲁斯就《广岛之恋》评论道:“在这次相遇的过程中,这个女人看见的并不是那些曾为人所知的死亡如何被抹除,而是她并未真正理解的死亡在持续重现,她不断看见的其实是自己的无知,即对生命和死亡之区别的不明就里。”^①这种记忆和遗忘的无能,导致了创伤的无法言说。同时,人类个体经验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让听众注定无法通过创伤叙述抵达事件的内核。正如杜拉斯所展现的那样,即使是二战的亲历者,也无法理解广岛核爆幸存者的创伤。简言之,卡鲁斯认为创伤叙事中的“双重讲述”并不是对人类语言的某种赋能,而是对其无力性的深刻暴露。

卡鲁斯将创伤从心理学引入文学研究,却又以历史之名关闭了个人与社会的记忆和认知通道,从而也把社会性关在了门外。在引入拉卡普拉的批评意见之前,不妨先看看当代脑科学与文化研究如何挑战了卡鲁斯这种基于否定性的创伤理论。首先,卡鲁斯的理论出发点是1990年代美国心理学学会对创伤的主流观点,即创伤会导致解离(dissociation)。她的科学依据来自美国精神病学家范德科尔克(Bessel van der Kolk)和荷兰学者范德哈特(Onno van der Hart)在1990年代初合作发表的经典论文《侵入式过去:记忆的可塑性与创伤的刻写》。在该文中,两位学者援引当时认知科学的观点,指出记忆是神经元组之间特定联结的生成,大脑认知必然伴随着分类的过程,即将新感知的经验事物放入之前知识记忆的联结中。^②由于记忆的联结性被创伤的解离效应破坏,于是创伤便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记忆——事件在创伤记忆中只有情感维度,而没有实在的意义。为了解释这一点,范德科尔克和范德哈特等学者以大脑生物学来说明这一过程:创伤发生时,大脑中负责感觉的杏仁体被激活,而负责在大脑认知过程中生产意义的大脑皮层则处于关闭状态,因为这一区域接受了过量的信号刺激,超过了大脑皮层的处理负载。^③

作为人文学者的卡鲁斯似乎将这种脑科学的解释模型视为牢靠的真理,并在后结构主义哲学的方向上做了进一步引申,认为创伤经验导致了意义的丧失,主体无法处理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关系,只能以幻想、幻觉、梦境等非理性叙述作为应答。根据这个模型,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和创伤经验的关系问题被重置了。卡鲁斯由此认为,对无意识进行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是无济于事的;或者说,这一派的创伤理论不再把无意识当成外部世界和内心意识之间的中介,无意识因为其复杂性和非结构性,也就不再是人文学的认知对象了。正如苏珊娜·拉德斯通(Susannah Radstone)的批评:“创伤理论家并不认为创伤可以触发更多的关联,而是在本体论上将之视为无法承受的事件本质。”^④一言以蔽之,1990年代随着大屠杀研究而兴起的创伤理论,实际上在脑科学理论的指引下走向了反精神分析的方向,其后果是让后现代创伤研究对主体的创伤经验内容选择了一种不可知论的立场。

然而,1990年代范德科尔克等人对于创伤的脑科学机制的阐释,在科学共同体之内被不断更新和修正,这也让卡鲁斯的理论陷入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尴尬境地。譬如,心理学家马丁·霍夫曼(Martin L. Hoffman)提出了另一种脑科学阐释模型,将创伤视为多种进程同时存在的复杂状态,而不是仅仅用“解离”来解释创伤患者的记忆和认知障碍。霍夫曼的理论主要是基于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对焦虑和恐惧的脑科学研究。表面上,与范德科尔克等人的理论一样,霍夫曼的创伤模型以“条件刺激—丘脑—杏仁体”这个神经回路来解释创伤的情动机制,以及为什么创伤无法由负责理性思考的大脑皮层来处理。然而,霍夫曼和勒杜在动物试验中发现,哪怕存在解离的力量,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同样可以意识到创伤进程的存在,因为除了这个回路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些包含了大脑皮层的回路,从而使得记忆和认知成为可能。^⑤事实上,已有相当多的临床案例证明,创伤可以进入记忆和认知活动。

①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p.37.

②See Bessel van der Kolk and Onno van der Hart, “The Intrusive Past: The Flexibility of Memory and the Engraving of Trauma,” in Cathy Caruth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69.

③See E. Ann Kaplan, *Trauma Culture: The Politics of Terror and Loss in Media and Literatur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4.

④Susannah Radstone, “Screening Trauma: *Forrest Gump*,” in Susannah Radstone (ed.), *Memory and Methodology*, Berg, 2000, p.89.

⑤See E. Ann Kaplan, *Trauma Culture*, p.37.

除了科学共同体对卡鲁斯创伤理论的“证伪”,文化研究学者卡普兰(E. Ann Kaplan)对后结构主义的创伤研究也提出了有力质疑。在那本写于“9·11”之后的《创伤文化:媒体和文学中恐怖和失落的政治》中,卡普兰针锋相对地指出:“(讲述创伤)故事尽管无法真正重复或再现过去发生的事情,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受害者实现‘修通’(working through)。它可能会带来一种共情的‘分享’,从而让我们继续向前,哪怕只能向前咫尺……(卡鲁斯的)理论显然忽视了创伤同时导致解离和代际传递的现象。”^①卡普兰对于卡鲁斯的这番修正,颇像米勒(J. Hillis Miller)对于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关于大屠杀见证的修正——尽管从哲学上看,的确存在一个不可再现的深渊,但在现实政治中,我们仍应该积极谋求叙述的可能性。当卡鲁斯强调创伤的不可治愈时,是站在德里达的立场上强调历史认识的永恒延异;当卡普兰肯定叙述创伤的意义时,则是站在更现实的立场,强调改善创伤症状的可能性。症候式的强迫性重复虽然无法修复创伤,却是走向疗救的第一步。如果不迈出这一步(无论它多么微小),那么将导致可怕的文化失忆,而遗忘即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死亡。

卡普兰对于“9·11”创伤文化的批判,与先前的创伤研究相比有显著的区别:前人多从心理治疗的临床个案出发,或从大屠杀和战争等极限事件中寻找思想资源;而卡普兰所说的创伤并非临床个案,也不是彻底不可见证的惊天浩劫,而是指向抽象层面的文化创伤,其发生机制与“9·11”事件的全球性媒体报道有密切关系。卡普兰特别强调的,是所谓的“媒介化创伤”(mediatized trauma),它不是直接暴露在“9·11”现场所造成的心理创伤,而是由于大众媒体对恐怖袭击影像的过度加载和传播造成的。显然,这种媒介化创伤是间接体验的创伤(vicarious trauma),一方面它对于更广泛的人群有着隐而不显的影响,另一方面媒介化的“9·11”影像及创伤话语有着令人不安的神话虚构成分。卡普兰试图打破“我们”的创伤和后“9·11”美国文化批判之间的二元对立,并提出这样的诘问:“为什么不能一方面对美国在过去和当下的行为展开充分的政治分析,而另一方面欢迎社会去公开讨论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间接创伤和治疗这些疾病的方法?”^②显然,卡普兰认为创伤研究应该选择一种中间道路:既不宜像拉德斯通那样,过于强调无意识对于创伤的解释力;也不宜像卡鲁斯那样,过度夸大创伤导致的解离效果。卡普兰试图将认知带回到创伤研究的中心,她相信当代媒介文化中的创伤现象与图像过载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作为刺激信号的接受者,而无法展开更积极的社会与历史认知。

二、移情、共同卷入与修通

现在,我们可以正式转入拉卡普拉的创伤理论了。一方面,与卡普兰等人一样,拉卡普拉不满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卡鲁斯、齐泽克(Slavoj Žižek)、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人在创伤理论建构中的否定性立场,因为这意味着创伤理论家关注的仅仅是创伤的“行动化复现”(acting out),而不是在当下谋求与过去的一种建设性关系,并在此过程中朝着“修通”的目标努力。^③另一方面,拉卡普拉与卡普兰亦有显著区别——后者的研究对象是当代媒介文化,而前者重视的则是二战、大屠杀、“9·11”等政治暴力创伤引发的历史书写问题。对拉卡普拉而言,历史书写不独指历史研究本身,同时也包括一切关于历史的文学再现和围绕历史创伤而产生的诸多批评理论。

拉卡普拉将“行动化复现”定义为“在一个人自己的话语和关系中重复或操演性地重演研究对象中活跃进程的趋势”^④。按照这个定义,研究奥斯威辛的历史学家、写集中营回忆录的幸存者、建构创伤叙事研究范式的文学批评家等,都可被视为在操演性地“复现”创伤。同时,在精神分析理论看来,这种复现与移情紧密相关。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将移情视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分析治疗手段,它可以帮助解放病

^①E. Ann Kaplan, *Trauma Culture: The Politics of Terror and Loss in Media and Literature*, p.37.

^②E. Ann Kaplan, *Trauma Culture: The Politics of Terror and Loss in Media and Literature*, p.16.

^③See Debarati Sanyal, “Review of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in *Substance*, vol. 32, no.2, 2002, p.303.

^④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p.36.

人的力比多,让病人将其童年或早年创伤记忆中的压抑内容转移到精神分析师身上。在弗洛伊德看来,病人面对精神分析师的这种强迫性重复固然与人的死欲(death drive)有关,但经由移情的疏导可给症状带来明显的改善,甚至达到治愈的效果。^① 精神分析上的移情很容易启发文学研究者,因为病人对精神分析师的施话关系可以类比为文学作品中叙述者向读者的讲述——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主动或被动地成为文学虚构声音的移情对象。如果说强迫性重复依然是创伤的症候,那么在弗洛伊德那里,移情就是人类意识的普遍现象,它“仅能通过分析来得以揭示和分离”^②。

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以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为例,认为《黑暗的心》的叙述者马洛受到库尔茨经历的影响,不可自控地向他人转述这段殖民暴力的骇人叙事,仿佛是一个感染者在“传播叙事病毒”^③。日本学者远藤(Fuhito Endo)则进一步认为,康拉德的小说语言“受到一连串重复的叙事欲望的驱动”,如果以心理分析的术语来描述,就是“一种离心的(centrifugal)叙事欲望,或者说,故事从死亡中心向外界的移情式传播,这种外部空间就包括读者”^④。而在《吉姆爷》中,叙述者马洛在面对吉姆的悲剧时,展现了一种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它体现为向心的(centripetal)情动,使得马洛如心理分析师一样让自己的力比多向患者(即吉姆)的过往创伤经验敞开。^⑤ 不难发现,一旦将文学与心理分析结合起来,如让-米歇尔·拉巴泰(Jean-Michel Rabaté)所言,“读者就不是中立的了,而是浸淫在情动的世界中:焦虑、快乐、乏味和移情之爱将会得以开启”^⑥。因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只是在体验情节或获取知识,更是在伦理层面介入“我”与“非我”的主体间性中。

循此思路,拉卡普拉认为创伤历史、创伤理论的研究者与其读者之间也存在移情和反移情的过程,其意义已不再局限于弗洛伊德或拉康式的心理分析,而成为人文研究视域下自我与他者之间产生“共情、怜悯、关心与爱”^⑦的心理动力学基础。这里,拉卡普拉显然将心理分析学中的移情概念做了一些修改和扩充。他看重的是历史研究者作为“观察者”的情感卷入程度,这意味着研究者与过去会产生一种复杂的对话关系,不仅需要倾听历史(甚至包括对沉默的倾听),也涉及对历史的“认同、吞并、投射、误解”^⑧等。我们无法确认张纯如罹患抑郁症后的自杀在多大程度上与其研究的南京大屠杀有关,但至少拉卡普拉看来,历史学者会在移情的影响下通过自身的写作“行动化复现”历史创伤。拉卡普拉由此将历史编纂中的移情视为自我与他者具有差异性的共同卷入(co-implication),它让人文研究的“伦理责任和政治能动性成为可能”^⑨。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从强迫性重复出发的移情一定会成为治愈的力量,因为从消极的后果来看,移情(包括共情)也会带来“仇恨、敌意、找人替罪(scapegoating)和暴力”^⑩。而后者恐怕才是拉卡普拉更关心的。

弗洛伊德本人对于反移情也抱有类似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明白反移情对分析师的情感冲击很大,如果缺乏很好的自我分析,将会破坏心理治疗本身;另一方面,他又沉醉于这种无意识的主体间性之中。^⑪ 如果说弗洛伊德担心的是分析师的情感健康,那么拉卡普拉忧虑的则是批评理论中的“趋创伤性”(traumatropism)。与植物的趋光性相似,当代人文研究的趋创伤性体现为“将创伤转化为崇高”^⑫的流行倾向。

①参见[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59—360页。

②Sigmund Freud,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trans. James Strachey, W. W. Norton & Company, 1963, pp.79-80.

③Peter Brooks, *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 Harvard UP, 1984, p.221.

④Fuhito Endo, “Queering the Death Drive: Counter/Transference Language in Joseph Conrad,” in Jean-Michel Rabaté (ed.), *Knots: Post-Lacanian Psychoanalysis, Literature and Film*, Routledge, 2020, p.94.

⑤See Fuhito Endo, “Queering the Death Drive: Counter/Transference Language in Joseph Conrad,” p.94.

⑥Jean-Michel Rabaté,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 Cambridge UP, 2014, pp.213-214.

⑦Dominick LaCapra, *Understanding Others: Peoples, Animals, Pasts*, Cornell UP, 2018, p.2.

⑧Dominick LaCapra, *Understanding Others*, p.57.

⑨Dominick LaCapra, *Understanding Others*, p.57.

⑩Dominick LaCapra, *Understanding Others*, p.57.

⑪See Fuhito Endo, “Queering the Death Drive: Counter/Transference Language in Joseph Conrad,” p.96.

⑫Dominick LaCapra, *Understanding Others*, p.173.

无论是解构主义创伤理论家(如卡鲁斯、费尔曼、劳布等人),还是小说家(如W.G.泽巴尔德)或哲学家(如齐泽克、利奥塔),他们的“趋创伤性”之所以值得警惕,乃是因为“不断地复制或上演一种碎片式的、极度忧郁的(或无法悲悼的)、深陷绝境的、‘后创伤的’、常常又令人着迷的反应,它既可以见证创伤(或者说,拉康式的‘真实’),同时又期望能实现一种否定的崇高性”^①。拉卡普拉相信,这种趋创伤性一旦成为思想上的定势,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将战争、大屠杀和“9·11”这样的历史创伤(甚至包括历史暴力本身)变成某种不可言说、不可理解的神秘之物,阻断了历史认知与记忆的可能性,而且将其神圣化、崇高化,从而使之成为后世语境下的一种超历史的存在。简言之,创伤即等于崇高性事件。或如安克斯密特(F. R. Ankersmit)所言:“在很多(而非全部)方面,崇高是‘创伤’这一心理学概念在哲学上的对等物。”^②

既然如此,当文学、艺术遭遇历史灾难与暴力的崇高性时,又能有何作为呢?基恩·雷(Gene Ray)的看法颇具代表性:“通过否定的方式唤出这些罪行,通过传统再现和叙事手段中的肯定性,为罪行的不可再现性作证,这样艺术就能公开承认它们所造成的损坏。”^③利奥塔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随着崇高美学的到来,19世纪和20世纪艺术的关键就是见证这一事实,即存在不确定性。”^④如此一来,艺术家的使命是再现不可再现性,见证文学的任务是见证奥斯威辛这类极限暴力的不可见证性,而批评家则致力于反复论证这种否定的再现,并将之作为后现代崇高美学的基本特征。艺术与批评实践中的“行动化复现”固然打破了阿多诺所言的“奥斯威辛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警告,却依然只是停留在原地,嗟叹创伤的无法治愈和无法认知。拉卡普拉曾如是辛辣地总结他对创伤理论家的批判立场:“我认为在沃尔特·本雅明那里,在德里达对本雅明心有戚戚焉的分析中……或者在詹明信、海登·怀特这样的人那里,时常会出现的一种情形就是:你所做的分析似乎无法让人获得其他形式的‘修通’;你似乎想要确认被创伤牵连是一种必要,但同时又想要获得政治上的方案。但最后得到的政治方案常常就是盲目的弥赛亚主义,是末日论政治,或者我称之为‘对空洞乌托邦的希冀’——这个乌托邦是彻底空洞的,因为你无法言说它,它与当下经历的进程没有任何瓜葛。”^⑤

至此,拉卡普拉的立场已呼之欲出:他承认移情让自我与他者在创伤事件中成为共同的牵连者,但在思考这种伦理关系时,他认为仅有悲观的、负面的、不确定的认识论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人文学者而言,如果要想获得切实可行的未来政治方案,就必须在发生移情和共同卷入后,更积极地“修通”历史创伤。英文中“work through”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动词短语,它指的是逐步解决某个困难问题,其潜台词是“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只能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进行,在过程中不断朝着最终解决去迈进。在心理治疗中,“修通”已经成为专业术语,它是创伤中解离的反过程,用以弥补解离导致的心理意识的断裂,并逐渐打通那些互不认识的局部,使得它们逐渐聚合为一个整体。拉卡普拉赋予了“修通”更为丰富的意涵,将之定义为“对移情的批判性回应,它激活补偿性力量以消弭未经中介的认同、行动化复现、强迫性重复和忧郁症,从而最大限度地恢复记忆”^⑥。显然,这样的“修通”是对反移情的一种自我分析,但其更大的意义不在于维护学者个体的心智,而在于社会层面的政治介入。“修通”是为了克服卡鲁斯认为的我们注定无法克服的绝境,它也许永远无法实现创伤事件的终结,也不见得会给受害者带来彻底的治愈,但是凭借“修通”,我们可以不再沉溺于创伤带来的殉道士光环,而“带着批评距离去审视问题本身,去区分过去、现在和将来”,并借此“让我们获得成为伦理行为人(ethical agent)的可能性”。^⑦

①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and Its Limits: Human, Animal, Violence*, Cornell UP, 2009, pp.5-6.

②F. R.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18.

③Gene Ray, *Terror and the Sublime in Art and Critical Theory: From Auschwitz to Hiroshima to September 11*,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6.

④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 trans. Geoffrey Bennington and Rachel Bowlby, Polity Press, 1988, p.101.

⑤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pp.152-153.

⑥Dominick LaCapra, *Understanding Others*, p.58.

⑦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p.144.

总而言之,拉卡普拉展现了实用主义的姿态,希望我们对“空洞的乌托邦”或“末日论般的恶托邦”实现一种“情境超越”(situational transcendence),并由此“对无法接受的现状施加社会的、政治的以及个人的基本改变”。^①毫无疑问,这种改变一旦在人文研究中实现,将会给社会带来一种新的政治性——它具有悲悯、正义和宽宏的气质,既不断尝试反思过去,也试图建构有益的未来。

三、跨学科:文学和史学的互鉴

拉卡普拉反复言明在历史创伤中构建“修通”的愿景,但是其方法是什么?如何在人文学科中实现类似心理分析师那种对于反移情的自我分析,从而“修通”历史创伤呢?答案或许藏在“跨学科”中。近年来,拉卡普拉一直关注跨学科性的问题,多次谈到文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并指出只有建构文与史的跨学科方法,才能开启以“修通”为核心的当代人文学。表面上看,“跨学科”这个提法并不新鲜,甚至已经成为各学科为了克服自身危机而提出的某种陈词滥调式的解决方案,但拉卡普拉的跨学科之思依然有其新意。其一,他所提倡的跨学科在英文中的前缀是“cross-”,而不是“inter-”。如果是“inter-”,那么意味着跨学科“既刺激又友好……暗示知识是一种温暖的、相互促进的、协商性的东西”^②。而以“cross-”为前缀时,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y)不再是将已有的不同学科简单接合和并置,并借此去探究已有问题的更好答案;相反,跨学科所思考的问题(如历史创伤、暴力或悲悼等)本身,就构成了对学科固有边界的一种僭越,解决这样的问题将倒逼学者以超学科的眼界反思自身领域的学科性。^③其二,既然“修通”是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再商榷,那么溢出传统学科边界的人文研究本身就是在遭遇作为他者的学科,跨学科的他异性因而也体现为不同学科范式、逻辑和研究风格之间的交织、摩擦甚至冲突。其三,拉卡普拉痛感这是一个后“9·11”、川普主义与后真相的时代,美国“当代社会和经济体系处于严重的混乱中”^④。是否能让文学与历史在跨学科协商中有力地批判并“修通”美国晚近的起源创伤,这或许将决定人文学科在不断被边缘化的今天能否重拾其合法性。由此,拉卡普拉对于当下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做了如下主张:“研究基本的、跨学科的,甚至是超学科的问题,解决这类问题并不具有狭义上的实用性,却可以让我们介入或增进一种开放的、审思与自我审思的探索过程。”^⑤

在拉卡普拉看来,文学与历史的跨学科协商或许正是实践这一主张的最佳方式。一方面,两个学科在传统上都关注现代性所造成的历史创伤;另一方面,文学再现和历史编纂本身也受到移情与反移情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后现代史学的“叙述转向”也让我们认识到文学与历史在某些方面的同构性。以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和安克斯密特为代表的“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编纂和文学虚构虽然不能混为一谈,但二者在修辞、叙述和语言结构上具有重要的相似性,甚至同一性。后结构主义史学强调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关注历史书写本身,尤其是历史叙事中“操演性的、隐喻性的、审美的、修辞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要素”^⑥,因为正是这些要素构成了历史叙事的结构。既然如此,以文学来“修通”历史创伤可行吗?拉卡普拉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后现代史学家如何处理犹太人大屠杀这段历史创伤,特别是如何解决一个重大的伦理困境,即在取消历史和文学界限的同时,不让试图否认或洗白奥斯威辛罪恶的“屠犹怀疑论”者得逞。

思考这一困境的重要坐标当然是怀特以语言和修辞为核心的“元史学”,也正是通过与怀特的辩难,拉卡普拉提炼出了他心仪的文学与史学的协商互鉴之道。我们有必要略费笔墨,来谈谈怀特当年提出的叙述主义转向究竟为何物。事实上,怀特并未回避历史创伤和历史再现之间的悖论。对于相信建

①Dominick LaCapra, *Understanding Others*, p.59.

②Joe Moran, *Interdisciplinarity*, Routledge, 2002, p.3.

③See Dominick LaCapra, *Understanding Others*, p.157.

④Dominick LaCapra, *Understanding Others*, p.175.

⑤Dominick LaCapra, *Understanding Others*, p.156.

⑥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p.1.

构主义的历史学者来说,把历史编纂视为一种文学虚构,并不是否认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也不是贬低历史编纂在讲述真实历史方面的能力;相反,他们认为小说的虚构叙事和历史编纂一样具有真理主张(truth claim),小说家可以像历史学家一样进行历史书写。^①譬如,《宠儿》(*Beloved*)以鬼魂的超自然叙事来编构情节,但这并不妨碍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反现实主义的虚构中讲述关于奴隶制的历史真实。当然,这种真实不是照搬现实细节,而是对历史过程所做的一种可信的再现,它能为重大历史事件提供有价值的洞见,甚至探究传统历史实证主义无法涉及的领域(如历史特定个体的心理活动和情感结构)。怀特相信,叙事“非但不是一个问题,反而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将认识转化为讲述”;而且,从 narrative 一词的拉丁文和梵语词源追溯考察,“叙述/叙事”一直是与“认识”(knowing)同根的。^②同时,恰恰因为小说叙事(尤其是那些具有伟大文学价值的虚构作品)和历史编纂都具有真理主张,怀特才能够区分新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历史相对论。在怀特秉持的新历史主义中,允许对第三帝国的历史提供“相互竞争的叙事”(competing narratives),但那种“以喜剧或田园化的事件编织方式来叙述第三帝国”的修正主义叙事,是注定无法在历史学界被合法化的。^③

那么,怀特青睐的讲述奥斯威辛的方式到底是什么呢?如何做到既有真理主张,同时又体现出历史认识的延异?怀特提出了一种叫作“中间语态”(middle voice)的历史编纂策略。顾名思义,所谓“中间语态”介于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之间,主语在发出动作时,同时也是受动者或动作的受益者;或者说,“中间语态”描述了一种反身性动作。^④怀特认为,“中间语态”的意义在于“似乎反抗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譬如及物和非及物、主动和被动、过去和现在、阳性和阴性)”^⑤。他发现这种语态特别适合书写那些处于模糊地带的历史创伤主题,它取消了主体和客体的差异,僭越了文类写作的边界,可以传达含混和不确定性。不难看出,怀特所指的“中间语态”在历史创伤书写中仅仅是一种类比,它与其说是语言学层面的革新,不如说是重新确认了古老语言系统中一种被遗忘的虚构叙事风格或策略,即采取一种反身性的、含混的叙事风格(如现代小说中常见的“自由间接引语”),来表达创伤记忆中不可言说的极端恐怖。

与卡鲁斯的不可知论立场相比,怀特显然更进了一步,他认为重大的历史创伤性事件是可以讲述的:“事实上,我不认为大屠杀、最终解决方案、浩劫、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或德国人屠犹比人类历史上其他事件更加具有不可再现性。只是它的再现,不管是用历史还是用小说,需要一种风格,一种现代主义的风格,这种风格可以用来再现现代主义所造就的那种社会经验,这种风格是很多现代主义作家都使用的,但其中的典范应该是普利莫·莱维(Primo Levi)。”^⑥怀特真正的立场其实是说,既然我们在现代社会遭遇的历史创伤是时代独有的,那么就需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和风格(如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加以叙述。如果说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创伤以无可名状的、崇高的恐怖和杀戮为特点,那么文学现代主义的“中间语态”作为叙事方法和风格则具有可贵的越界性和含混性。按照怀特的看法,正是凭借“中间语态”这种充满反身性的现代主义风格,小说家才得以“挑战事件和事实的区别,质疑过去与现在的分野,并且模糊现实和再现的界限”,其文字指向的不只是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同时也指向了再现“永不离去的过去”时语言所面临的困境。^⑦这再度确认了怀特的立场,即历史编纂中的真理主张能否实现,与作者选择虚构或非虚构无关,而是取决于历史叙述的修辞和风格。同时,怀特并不认为

① See 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p.13.

② Hayden White, “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Critical Inquiry*, vol.7, no.1, 1980, p.5.

③ 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pp.17-18.

④ 譬如,古希腊语中的“中间语态”经常是反身性的,指示主语做关于自身或为了自身的行动。如 louomai 这个动词,其意义是“我洗自己”(I wash myself),或者在 louomai khitona 这样的动宾搭配中,其表达的含义是“我为自己洗衬衣”(I wash the shirt for myself)。

⑤ 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p.20.

⑥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Saul Friedländer (ed.),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52. 怀特这里是用莱维的《元素周期表》来举例子。

⑦ Herman Paul, *Hayden White: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Polity Press, 2011, p.135.

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他所嘉许的历史叙述风格是现代主义的。怀特心目中大屠杀文学叙事的典范,是普里莫·莱维和斯皮格曼(Art Spiegelman),因为二者都重视故事讲述,但同时又在作品中对历史再现的限度进行了自反性思考。

拉卡普拉正是在这里与怀特分道扬镳,因为前者并不认为文学化的历史创伤书写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进一步说,拉卡普拉对“中间语态”抱有某种怀疑态度,因为这种对于施动和受动的含混处理,以及对矛盾和不确定性的推崇,在作家笔下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导致某种滥用”^①。一个滥用“中间语态”的大屠杀题材的作品是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朗读者》(*The Reader*)。拉卡普拉对《朗读者》的不满在于,虽然施林克未聚焦于女主人公汉娜的意识,并以自由间接引语这种典型的“中间语态”来展开历史叙事,但小说家选择的米夏的情人视角,实际上在读者心中已经构成了朝向纳粹守卫的模棱两可的共情。这就导致汉娜居于读者的意识中心,而死亡的犹太囚犯只是偶尔在法庭上顺带提及,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让犹太受害者群体的苦难被边缘化和模糊化”^②。必须强调的是,拉卡普拉并不完全否认“中间语态”的价值;他真正反对的,其实是对这种叙述风格的过度使用——其危险性甚至超过了它潜在的价值。拉卡普拉严厉地指出,滥用“中间语态”“可能会系统地削弱或毁掉二元对立,甚至会在某些争议性的领域,取消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间的一切差异,因为它似乎在一般意义上削弱了关于能动性和责任的问题”^③。因此,他提出应该进一步明确“中间语态”的使用限度,尤其是在涉及大是大非的伦理责任的历史论述中,要确保“中间语态”的使用得到其他叙述方式的有效制衡。

由此,我们发现拉卡普拉和新历史主义之间最大的龃龉,其实是如何在跨学科的框架下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对于怀特、安克斯密特等人来说,历史研究中的叙述主义克服了过去实证主义史学的局限,释放了历史书写的多重可能性,但同时又坚守了真理主张。怀特关于叙述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源自现代主义文学,甚至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的丰富可能性滋养了其历史想象。这种文学叙事风格对后结构主义历史学的启发,也颇符合拉卡普拉所总结的人文学科核心精神——“赠礼”(gift-giving)^④。反过来,历史给文学研究的“赠礼”,往往是与文本相关的知识、素材和背景,历史甚至被解释为文学得以形塑的语境力量。不过,拉卡普拉真正认可的文学与历史的跨学科关系,远比这种互相发明的模式要复杂。进一步说,跨学科性并非只有兼收并蓄,还应该体现为一种“知识怀疑论”,凭借它“才能更有效地在不同人文学科之间发展跨学科视角”^⑤。由此,跨学科应该是“一种把历史和文学带入相互争鸣挑衅(provocative)的研究形式——历史解读遭到批判理论(包括文学理论)的挑战,而文学理论不仅受到历史问题的启发,且不断被后者审问(interrogate)”^⑥。

依照这样的模式,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远比新历史主义者构想的更加紧张、复杂:二者在其接触地带应该对彼此的学科基本观念发出激烈的质疑,而不是美美与共的简单接合或学科联姻。恰如菲尔斯基(Rita Felski)所言:“历史不是盒子……语境并不自然而然或不可避免地胜过文本,因为语境的定义标准以及解释策略的优劣,通常是在阅读中遭遇人们的期待、质疑、扩展或重新想象。”^⑦但是拉卡普拉反过来强调,一味追求文本对历史语境的超越与否定,也可能会带来严重问题,因为文学在这里被想象为“灾难性的却又崇高的旋涡——就像黑洞——如同吞噬一切的‘黑暗的心’,可能将我们所有人变成活死人”^⑧。在马拉美、克尔凯郭尔、贝克特、海德格尔、布朗肖、德曼和德里达等人身上,拉卡普拉都看见

①Debarati Sanyal, "Review of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p.303.

②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p.201.

③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p.26.

④拉卡普拉认为,除了“赠礼”,人文研究的另两个核心精神应该是“自由性”(liberality)和“宽容”(generosity)。See Dominick LaCapra, *Understanding Others*, p.155.

⑤Joe Moran, *Interdisciplinarity*, p.81.

⑥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Literature, Critical Theory*, Cornell UP, 2013, p.1.

⑦Rita Felski, *The Limits of Critiqu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pp.159-160.

⑧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Literature, Critical Theory*, p.18.

了这种对待文学艺术的“后末日论”(post-Apocalyptic)倾向。所以,历史需要不断审问文学的诚与真,而文学亦要坚持挑战历史叙述背后的观念预设和价值判断。

就创伤而言,文学与历史的这种紧张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真理主张和语境。首先,文学理论中的创伤研究既不能完全脱离历史研究中的真理主张,也不能仅仅围绕真理主张打转,因为它仅仅是虚构或非虚构叙事的价值之一,而非全部。拉卡普拉指出:“我认为真理主张是历史学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它必须和历史编纂的其他维度充分结合在一起,包括共情的、共鸣的理解,以及对语言操演性的、对话性的运用。”^①当代创伤理论的窠臼,或许在于其言说框架始终无法离开“真理主张”这个“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并由此衍生出各路理论——它们或是关于语言再现创伤的不可能性,或是建议用模棱含糊的“中间语态”来处理历史创伤经验中巨大的不确定性、不可知性。然而,要想实现真正的“修通”,文学家、批评家与历史学者需要超越真理主张的执念,谋求自身学科的历史话语或写作在现实政治的层面有效介入,为个人和集体创造一种有价值的未来性。其次,文学研究中既有语境还原主义的倾向,也有试图彻底摆脱语境以实现超越的倾向。前者受到历史主义的影响,习惯将文学生产与文学经验视为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中的某种症候;后者则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即以极端的形式主义谋求彻底摆脱历史,将文学的自律性视为后世俗时代的某种救赎甚至是准宗教,而“大屠杀”或“奥斯维辛”成为“不可言状之物的特权化名字”,并进而幻想出一种超历史的崇高冲动。^②同理,安克斯密特所说的“崇高的历史经验”(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也是从美学中的崇高出发,将创伤放到了知性范畴和个人想象之外。简言之,文学与历史的相互审问和挑衅,在于重新认识语境的极端复杂性。它既是文学在“修通”创伤时无法回避、不应绕过的历史通道,同时也不应该是唯一决定文学语言、修辞和叙述风格的因素。

四、结语

葛兰西《狱中书简》中有一句话放在最后非常恰切:“在智性上做悲观主义者,但在意志上做乐观主义者。”拉卡普拉实践的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学者精神。他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大屠杀历史和文学,坚持以“修通”为目标去对抗学术工作中不可避免的移情。他深知批评理论中盛行的依然是否定性批判,意识到这个时代的社会危机、学科危机(特别是人文学科的日益边缘化和合法性的丧失)。拉卡普拉对人文学科和当下社会(尤其是美国)的问题意识,使他看见了跨学科研究更为迫切的使命。文学与历史的相互砥砺和激发既不是回到历史决定论,也不是将文学经验神秘化并使之超然于语境,而是寻找一条超越学科藩篱和思想绝境的中间道路,同时又不寄希望于任何乌托邦或末日救赎。

拉卡普拉拒绝像历史主义者那样把自己仅仅视为一种影响,而非具有改变力的行动参与者。无论是强调政治经济关系决定论的历史主义,还是文化研究者的福柯式历史主义,最后都难免滑向伦特里奇亚(Frank Lentricchia)所描述的政治窘境:“我们痛恨那个并非由我们所造的世界,渴望去改造它,但最后却安于从现实中逃逸出去,找一个安全封闭的空间,在那里表达审美无政府主义,享受一段悠长的周末假期,从而消弭我们不幸生活的激进性后果。”^③拉卡普拉对于创伤研究的批判和改造,体现了他试图恢复一种跨学科的、面向现实政治的人文研究愿景。不过,他没有系统描述这种跨学科“修通”创伤的方法论,而是主张一些基本伦理立场(譬如,与他者的共同卷入和反对将创伤崇高化)和反思原则(譬如,在人文研究中的审问和自我审问)。他虽然没有给出详细的答案,但是呼吁我们一起去寻找它。

(责任编辑:陆晓芳)

①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p. xxxii.

②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Literature, Critical Theory*, pp. 18-19.

③Frank Lentricchia, “Foucault’s Legacy—A New Historicism?” in H. Aram Veese (ed.), *The New Historicism*, Routledge, 1989, p. 241.